

目 录

编者前言 / 程志敏	1
哈瓦德《厄庇诺米斯》概疏	47
劳埃德《厄庇诺米斯》导引	95
塔 兰 柏拉图的论题和《厄庇诺米斯》的结构	106
塔 兰 《厄庇诺米斯》,亚里士多德和早期的学园	200
塔 兰 《厄庇诺米斯》在柏拉图式学说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221
后 记	241

编者前言

如果说古代文献的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那么柏拉图的运气就算得上很好,甚至比著作等身的亚里士多德还要好:亚里士多德的早期作品几乎全部失传了,而据说柏拉图的“所有”著作都传下来了。^①但这些著作都是柏拉图的“真作”即都出自柏拉图之手吗?其中是否有他人的托名之作即“伪作”?此外,柏拉图著作(真作)的总和就是柏拉图思想的全貌吗?如果不是,那些伪作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柏拉图思想的本质?具体到所谓“真伪”的问题,柏拉图的思想是否仅仅体现在他自己的“真作”中?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让人聚讼不休的概念——“真”?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住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柏拉图著作的真伪,以此来修正自己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一件重要文献真伪问题的讨论,既考察着思想史的“客观”面貌,也反映出讨论者的个人品味和思想路数,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度来:我们在柏拉图著作的真伪这面镜子中,看到的更多是我们自己。

^① 正如泰勒所说:“我们在较后的古代,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提到过一部我们至今还没有掌握的柏拉图著作。”(《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页)另参W. K. C. Guthrie,《希腊哲学史》(*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V. 4, p. 39。

一、现代真伪问题概览

自从忒拉叙洛斯(Thrasyllus)在公元1世纪初编定柏拉图著作的“全集”后,这36篇作品,即35篇对话和书信(共13封,合算作1篇),在古代就很少遭到怀疑(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斯除外)。但到近代以后,尤其是19世纪以来,绝大部分柏拉图著作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学者们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纷纷宣称古人笃信不疑的经典名篇其实不过是“伪作”。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苦心证明”那些著作乃是柏拉图的“真作”。

由此可见,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问题与所谓的“荷马问题”、“圣经问题”和“苏格拉底问题”一样,主要不是纯粹的学术考据问题,而是“现代性”的义理问题,只有在一个疑古成风以求证当今之是、打倒偶像以凸现自我之高明的“现代”,才显得如此多姿多彩。这种看似鲜艳的学术花朵背后隐藏着极其破败凋零的思想世界,上述所谓的种种“问题”正是开放在现代性荒原上的“恶之花”。我们并不否认“考订”(athelizing)在学术上的价值,毕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是学术的根基。但“考订”蜕化为“怀疑”,并成为虚无主义的帮凶之后,它所取得的有限成就丝毫无法抵消它所造的罪孽,其旨趣和成就也就湮没不闻甚至荡然无存了。

有了这番预备性的考察后,我们在反思这个现代性问题时,也许才不至于重蹈覆辙。我们一方面不能因噎废食而全盘否定现代学术尤其在考订方面的成就,但同时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这个“真伪”问题的怪异乃至病态的背景,俾使自己不落入现代性的泥沼;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再次提起这个危险的“真伪”问题,恰恰就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更恰当地说,就是为了摆脱一种思想的梦魇(尽管它恰恰就是邪恶的盛宴),超越一种已经让人误入歧途的思维方式,重新把心灵纳入古人开创出的高明之道中来。当然,这仅仅是一个

开始。

就《厄庇诺米斯》(*Epinomis*, 以下简称《厄》)来说,16 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帕特里奇(Francesco Patrizzi, 1529 - 1597)虽然站在柏拉图的立场上来反对亚里士多德,堪称是柏拉图的忠实信徒,但他在其《逍遥论学》(*Discussiones Peripateticae*, 1571)中受到了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 公元 3 世纪,以下简称“第欧根尼”)和雅典学园最后一任掌门人大马士丘(Damascius, 480 - 550)的影响,也不承认《厄》出自柏拉图之手(而像第欧根尼一样认为《厄》是柏拉图最亲密的弟子奥波斯的菲利普[Philip of Opus]所著)。如果这种看法还代表着公元 3 世纪以来的中古观点的话,古典语文学家李尔(Abbé Claude Sal Lier, 1685 - 1761)在 18 世纪为否认《厄》的真实性所提出的三个论据就为后来全面质疑柏拉图著作的风潮奠定了基石,同时也为现代学术凭靠“语文学”这个技术性颇强的工具来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作业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榜样。^① 他从风格、品质和柏拉图方式等角度认为《厄》不是柏拉图的真作,他的论据与第欧根尼以来的观点大为不同,已经是颇为成熟的现代方法。李尔的影响虽然还不是太大,但毕竟比因提出“荷马问题”而名声大振并影响深远的沃尔夫(F. A. Wolf)早了好几十年。

这种情况到了 19 世纪以后,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疑来疑去,差不多到了要彻底否定柏拉图的地步——这种现代性“为之反倒害之”的悖论不独柏拉图研究为然。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中,那些声名卓著的“专家”就是当然的急先锋,他们的专业知识受

① 塔兰,《学园:柏拉图、菲利普及托名柏拉图的〈厄庇诺米斯〉》(Leonardo Tarán, *Academica: Plato, Philip of Opus, 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75), 页 13。该书是第一部《厄庇诺米斯》的考订评注本,其结论虽有大可商量的地步,但其材料却非常翔实:《厄》译成中文也就两三万字,塔兰这部书却有四百多页,由此可见我们的西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算入个门恐怕也还要好几十年。

到某种错误思潮的引诱和误导后,会产生比偏见更可怕的力量。

大名鼎鼎的神学家、古典语文学家施莱尔马赫堪称现代解释学的鼻祖,而他为其所翻译的柏拉图著作所加的评注或导论,既是现代柏拉图研究的重镇,同时也是拒斥柏拉图著作真实性的开山之作之一。施莱尔马赫的古典语文学功夫自然相当深厚,其译文当然也堪称大家手笔(尽管也总会有不同的意见),但他受到当时思想的影响而把柏拉图打扮成了“浪漫派诗人”,尤其是受康德所谓“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这一错误现代解释原则毒害不浅,因此他的柏拉图解释需要小心对待。^①就真伪问题而言,施莱尔马赫从语言、主题和形式等几个方面,把许多名篇排除在柏拉图作品之外。他的《柏拉图对话导论》分为三个部分,只收录了柏拉图 31 篇作品(而不是 35 篇,不算书信),柏拉图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法义》(*Laws*)也只是在该书导论中稍微提及。而且就在这 31 篇作品中,施莱尔马赫把《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和《伊翁》等 13 篇作品放进了前两个部分的“附录”中,也就是怀疑这些作品的真实性。他虽然很委婉地说,把这 13 篇作品放进附录,远不是意味着马上就要否认或质疑其源自柏拉图,但在讨论《米诺斯》和《阿尔喀比亚德后篇》等大多数放入附录中的著作时,却明确地否认了它们的真实性。^②

① 参刘小枫译注:《柏拉图的〈会饮〉》,“译者弁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第5页。

② F. Schleiermacher,《柏拉图对话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Dialogues of Plato*, translated by William Dobson, 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2),“判断标准”,参页 32,“附录问题”,参页 134。由此我们大体可以明白“解释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使命,而不幸的是国朝名士似乎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现代解释学理论的这种“先天”(a priori)不足。我们在这里不讨论“现代解释学”的时代上限及其与施莱尔马赫所谓的“古典解释学”的关系,而只是从其思想实质把它们都看作广义的“现代”解释学。其实,与古典学相比,解释学不过是现代人特别痴迷的空洞的理论游戏而已。

施莱尔马赫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特别看重《王制》(*Republic*),全书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讨论全部 31 篇中的 30 篇对话,而整个第三部分只讨论《王制》。由此可见施莱尔马赫等疑古派的一个基本思路:以《王制》为坐标来判断其他作品的真伪和先后次序,在他们看来,《王制》是柏拉图最成熟也最可信的作品,因此凡是与之在文风、措辞、结构和主旨方面有所不合的,就是伪作。他们认为柏拉图自早年起就有了成熟的思想体系和自觉的写作意图,毕生都在围绕一个统一的观点在思考和创作,凡是与此有悖者即不可信。^①

从此以后,否认古代经典——包括柏拉图著作——真实性的做法就成了 19 世纪西方学术的“显学”,或者用泰勒的话说,“19 世纪中叶,特别在德国,‘考订’(athelizing)柏拉图的对话录成为学者们的一种时髦娱乐;《法义》被阿斯特(Ast)宣布为假的,而且策勒尔(Zeller)也曾经如此,《帕默尼德》、《智术师》和《治邦者》则受到宇伯威格(F. Ueberweg)等人的怀疑;极端主义者想把纯正的对话录限制到 9 篇”。^② 这位否认《法义》和《申辩》真实性的阿斯特就是施莱尔马赫的高足。除了古典语文学家而外,哲学家也参与到否认柏拉图著作真实性的大合唱中来。著名的哲学史家、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就认为柏拉图作品似乎大多有问题,而“在可疑作品中最重要的是《智术师》、《治邦者》和《帕默尼德》。这些作品也许不是柏拉图创作的,很可能是他的学派中与爱利亚派的辩证法和论辩术有密切关系的人们写成的”。^③

实际上,这帮功力深厚的专家连同某些古人一起,最终只给

① 参 Charles H. Kahn,《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对话》(*Plato and the Socratic Dialog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页 38-39。

② 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页 23。

③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上卷,页 142-143。

柏拉图留下了5篇从未遭到怀疑的著作。在19世纪,以下著作曾为当时的不同学者拒绝过:《游叙弗伦》《申辩》《拉克斯》《吕西斯》《卡尔米德》《希琵阿斯前篇》《希琵阿斯后篇》《阿尔喀比亚德前篇》《墨涅克塞努斯》《伊翁》《美诺》《欧蒂得谟》《克拉底鲁》《帕默尼德》《智术师》《治邦者》《斐勒布》《克里提阿》《法义》《厄庇诺米斯》《阿尔喀比亚德后篇》《忒阿格斯》《希普帕库斯》《情敌》《米诺斯》和《克利托普丰》。除去这26篇,柏拉图的“真作”就只剩下泰勒所说的那些极端主义者能够接受的9篇了。虽然后来的情形随格罗特(G. Grote)拼命扭转而大为改观,但上述26篇中的最后6篇即便在稍微温和一点的疑古派那里,也未能获得一席之地。至于说柏拉图的13封书信,除了极少数外,在当时的风潮下自是不能幸免。

总之,正如格里(W. K. C. Guthrie)所评价的,“19世纪尽了最大努力从我们手中劫掠(rob)柏拉图著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如果我们接受19世纪的这些时髦的考订成果,那我们就几乎只好“放弃对柏拉图的研究”了。^①因此,学者们主张,“除了极有分量的理由之外,不应该使这一类文献听任‘考订者’处置”,而目前在柏拉图真伪问题上的偏差,都是把语文学的地位抬得过高的结果,为此泰勒亦对大名鼎鼎的维兰莫威兹(Wilamowitz)提出了批评。^②

但就在这种全面的疑古风潮中,也不乏有人中流砥柱。正如泰勒所说,“幸亏自从坎佩尔(Lewis Campbell)苦心证明《智术师》和《治邦者》是真作以后,这个趋势转变了。现在有一个普遍一致的意见,即36篇对话录中的每一篇,不论其篇幅和重要性如何,都是柏拉图的;对于若干篇幅较小或趣味较少的伪作也有同样普遍一致的意见,尽管还有一两篇著作大家意见有分歧”。^③泰勒所

① 格里,《希腊哲学史》,前揭,页40。

② 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页27、30。

③ 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页23。

说的坎佩尔的“苦心证明”是指坎佩尔 1867 年出版的《柏拉图的〈智术师〉和〈治邦者〉》(*Plato, Sophistes and Politicus*, Clarendon 版)。

泰勒把柏拉图著作真伪问题的转折点放在古典学家坎佩尔 (1830 - 1908) 对《智术师》和《治邦者》的辩护上, 这似乎不太恰当, 因为坎佩尔的工作无论在时间、数量、质量和影响上都无法与他的同胞格罗特 (1794 - 1871) 相提并论。格罗特不仅仅是为柏拉图的某一两部著作进行辩护, 他是为整个“柏拉图全集”的真实性而砥柱中流。他那部三卷本的著作 (*Plato and the Other Companions of Socrates*, London, 1865) 不仅早于坎佩尔, 而且对坎佩尔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坎佩尔在其“苦心证明”的著作出版的前一年, 就写过一篇书评讨论格罗特的著作 (*Quarterly Review*, 119 [1866] 108 - 153)。格罗特思考荷马、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及整个希腊历史方面的问题也比坎佩尔早了许多, 他毕竟比坎佩尔年长得多。格罗特的主要兴趣在于历史, 而坎佩尔的兴趣则主要在于悲剧, 尤其是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

格罗特其实早在 1856 年就开始着手准备他那部讨论柏拉图著作真伪的书,^①而这一年他已完成对古希腊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 其 12 卷本巨著《希腊史》(*A History of Greece*) 历时十年后陆续出齐。格罗特在这套书中就开始涉及类似的问题了, 他在《希腊史》中专门辟了一章来讨论苏格拉底, 而这一章差不多长达一百页。^② 尽管格罗特在柏拉图真伪问题上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许多“不确定的命

① 尤其第四章“由忒拉叙洛斯重识的柏拉图经典” (“Platonic Canon, as Recognised by Thrasyllus”) 和第五章“由现代评论接受与修改的柏拉图经典” (“Platonic Canon, as Appreciated and Modified by Modern Critics”)。

② 参格罗特,《希腊史》(George Grote, *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Generation Contemporary with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 1872, 这个版本把原先的 12 卷编成了 10 卷), 见 Thoemmes 出版社 2000 年重印本, 第 7 卷, 第 82 - 174 页。

题”(策勒尔语)上,但他的观点并没有过时或被其他人所推翻,后来者毋宁是对他的限定和补充,正如潘戈(Thomas L. Pangle)所评价的,“格罗特用一种严格史学的论证方法捍卫了整部[柏拉图]经典的真实性,这种论证似乎值得我们予以最严肃的关注——即便它需要一些大动作的限定和补充”。^①

事实上,格罗特的影响逐渐扩大,^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人们已慢慢放弃了极端的怀疑态度,开始认识到疑古派的弊病,已不那么自以为是,并逐渐把兴趣从“真伪问题”转移到柏拉图作品的编年上,各家各派虽还在不同程度上对归在柏拉图名下的某些作品持保留意见,但如果怀疑得过分了,编年问题自身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差不多都是“伪作”,还有什么必要为其排顺序呢?^③ 在著名的

① 参潘戈,《政治哲学之根》,“编者导言”(Thomas L. Pangle,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页6。塔兰认为策勒尔对格罗特的批评就已经把格罗特的假设“撇到一边去了”(Tarán. *Academica: Plato, Philip of Opus, 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 p. 5),但潘戈认为远不是这么回事,并逐一为格罗特辩护(参《政治哲学之根》,页8-11)。潘戈对塔兰这部功夫之作似乎很不以为然(页15-16)。也许,小学功夫再好,但如果思路不对,其成就也会有限。

② 关于格罗特的巨大影响(大名鼎鼎的John Stuart Mill称其为“前无古人”),参Kyriakos N. Demetriou编,《19世纪的经典:回应格罗特》(*Classic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sponses to George Grote*, Bristol: Thoemmes Continuum, 2003, 四卷本)。关于格罗特的相关影响,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在维多利亚时代同样以充分的理由反对沃尔夫于1795年提出的现代“荷马问题”,其《希腊史》第一卷对上古文明的看法极大地冲击了那些“现代”的观点,参特纳,《荷马问题》(F. M. Turner, “The Homeric Question”, see Ian Morris and Barry Powell (eds.),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 Leiden: Brill, 1997, 页134-136)。

③ 现代人对柏拉图著作编年的看法,参Leonard Brandwood,《柏拉图对话手表》(*The Chronology of Plato's Dialogu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该书共23章(含导论和结论),每一章讨论一个专家的意见,其中大多是学界的柏拉图专家(包括W. Dittenberger和C. Riiter等德国重量级人物)。

牛津版柏拉图全集中,编者就收录了所有真作和伪作。^①而晚近出版的英文版柏拉图全集,则走得更远,其编者厌倦了在真伪问题上无法避免的主观判断后,认为现代人没有资格去决定哪些著作应该收入柏拉图全集中,因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因此该版本在尊重古人的前提下甚至收入了被忒拉叙洛斯认为绝对是伪作的《释词》(Definitions)、《论正义》和《西绪福斯》等,共收录了45篇作品(含格言语录一篇)。^②

不过,即便库珀(Cooper)编本收录了柏拉图的“所有”著作,包括古人已认定为伪篇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编者及其译者就认为这些著作都是柏拉图的,而是仍然按照现代传统的看法为那些有疑问的著作打上了剑号和星号,并在每一部伪篇的译文前所加的简短导言中明确地对这些“柏拉图著作”表示怀疑。

在20世纪的学者中,真正相信这些作品真实性的差不多只有施特劳斯及其门徒。柏拉图的著作按照其“真伪”的程度不同而分成了“真作”、“可能”、“可疑”和“伪作”,经过格罗特等人据理力争后,大多数学者能够接受那些“可能”出自柏拉图之手的著作,也勉强承认某些“可疑”的著作。但施特劳斯及其弟子们却把“真作”的范围扩大到了一般认为“可疑”的作品上,他们不仅认可现代学者慢慢认同的《希琵阿斯后篇》和《伊翁》,还把大家“公认”的伪篇《希普帕库斯》和《情敌》等视为“真作”,尤其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还把这些伪篇看作是了解柏拉图思想的重要窗口。^③这种看法虽然在古人那里也能够找到同盟军,但对于满脑子现代观念的人来说,的

① 伯内特编,《柏拉图全集》(Ioannes Burnet [ed.], *Platonis Opera*, Oxonii: Clarendon, 1905-1910)。

② J. M. Cooper, D. S. Hutchinson 编,《柏拉图全集》(*Plato: Complete Work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③ 上引潘戈所编的那本书就是施特劳斯学派慧眼独具的结晶。其中,施特劳斯亲自为《米诺斯》撰写解读文章,不仅丝毫不怀疑其真实性,而且直接把它当作理解柏拉图《法义》的桥梁(《政治哲学之根》,页67-79)。(转下页注)

确有些突兀。

看来,要弄明白这个棘手的“真伪”问题,我们还得从柏拉图著作的文本史谈起。

二、柏拉图的著作及其编纂

柏拉图著作的真伪,即究竟哪些作品属于柏拉图,或者说柏拉图一生究竟写过哪些作品,这个问题最早由谁提出来的?他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提出真伪问题?柏拉图的“全集”最早由谁编纂,这些编辑家依据什么版本,他们的工作有多大的可信度?对此,我们需要顺着文本的流传顺序往回追溯,顺藤摸瓜去考察柏拉图著作的来龙去脉,以此从根本上解决(或解释)其真伪问题。

英、德、法、意等国都有专家对柏拉图著作进行了艰苦的校勘,也都有自己的“柏拉图全集”(Platonis Opera)的现代编本,有的国家还不只一种古希腊文“全集”,比如英国就有牛津本和洛布本(Loeb),其中最受学界认同的要数伯内特(Ioannes Burnet)编校的牛津本。^①这些全集本都收录了柏拉图的“所有著作”,因而似乎无法对“真伪”问题有所参考,而此前一直到公元16世纪出版的编本似乎也不能给出真伪问题的答案,因为这还不到问题的源头处。最

(接上页)而其弟子布鲁尔(Christopher Bruell)就把《情敌》当作了解[柏拉图]政治哲学原始意义的重要文本(同一著作,页91-110。关于布鲁尔对其他“伪篇”的看法,见氏著《论苏格拉底教育:柏拉图短篇对话引论》(On the Socratic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horter Platonic Dialogu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① 参刘小枫译注:《柏拉图的〈会饮〉》,“译者弁言”,同前,第4页。牛津十年前又在编辑新的柏拉图全集本,以代替Burnet的老版。新版据说更简洁、更准确,引证了更多的抄本。这些编本的“始祖”是1513年威尼斯的Aldine本,而这个现代出版的本子则以公元10到公元11世纪的手抄本为底本。

早提出“真伪”问题的是第欧根尼,他在《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学说和格言》(中译本简作“名哲言行录”,似不太恰当)中最早提出了“柏拉图学案”,他总结了阿里斯托芬和忒拉叙洛斯的编排,提出了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问题。我们将逐一往前考察,首先清理这个问题的外部线索。

1. 第欧根尼·拉尔修

我们据以判断柏拉图著作真伪的材料,主要是第欧根尼·拉尔修(其鼎盛年为公元3世纪上半叶)的记载,他的记述在数千年的柏拉图经学史上,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任何研究者似乎都不能不提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他的记述甚至几乎是惟一可资参考的文献)。但第欧根尼的这部学案,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他与柏拉图学派的关系疏密程度如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的判断?

《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学说和格言》第三卷谈柏拉图,共109节,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1-47节讲述柏拉图的生平,48-66节叙述柏拉图的著作,余下的部分介绍柏拉图的“学说”或“主要观点”。与我们论题直接相关的第二部分又可分为三个更小的部分,开头和结尾介绍柏拉图的“对话”特点以及阅读柏拉图所应采取的方法,而中间部分(56-62节)则详细地记录了忒拉叙洛斯和阿里斯托芬的编纂工作,这部分为后世大加征引,重复千万遍之后几乎已成“定论”。

第欧根尼的记载究竟有多大的可信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写作目的,如果他是要写一部较为客观的学术史,那么就大体可信;但如果他仅仅为了说明自己或本派的观点,兜售私货,那么我们就需要小心对待。为此,我们且先分析整个第二大部分的内容,看看第欧根尼通过其选材到底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48-51a节交待“对话体”的由来和性质,51b-52节证明柏拉图不是教条主义者(从其对话和逻辑就可知),53-55节从对话逻辑的角度进一步阐释柏拉图学说的性质,56节讲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借鉴了悲剧,而忒拉叙洛斯就以悲剧的四联剧(tetralogies)形

式“发表”或“出版”了柏拉图的对话。57-61a 节完整地叙述忒拉叙洛斯的“四联剧”式的柏拉图“全集”，这个部分几乎为绝大多数讨论柏拉图真伪问题的学者所引用，因此它虽然十分重要，我们也觉得没有必要在此再次重复这个随便哪部相关著作中都能找到的材料。61b-62a 节对比讨论拜占庭语法学家阿里斯托芬的“三联剧”(trilogies)编排体系。62b 节列举各家各派关于柏拉图著作之开端的观点，这里的“开始”一词含义颇为模糊，从上下文来看，应指我们研读柏拉图的次序，而非柏拉图的创作顺序(详下)。而 62c 节则叙述了“大家公认”的“掺假”的伪作，这个论断为后世所有学者所接受，而其内容也不再纳入柏拉图著作范围内。^① 第欧根尼的这部分内容是古代对柏拉图著作真伪问题规模最大的一次清理，这样庞大的工程不太可能是他一人之力能够完成的，由此可见柏拉图著作真伪问题在第欧根尼时代可谓十分常见。

从整个第三章来看，第欧根尼撰写的是“柏拉图导读”，^②而中间所引的忒拉叙洛斯和阿里斯托芬的编排对比，以及作者明显偏向忒拉叙洛斯的立场，则不仅是简单地列举柏拉图的著作，而是表示作者所采信的一种阅读柏拉图的顺序(详下)。既然这是一篇“导读”，那么其中的记载自然比寓言故事更为可信，尤其中间罗列的忒拉叙洛斯和阿里斯托芬的文献部分(这种史料是不可能伪造得出的)，但它却并非柏拉图学园中人的“传灯录”，其可靠程度当然要大打折扣。据西方学者分析，第欧根尼的生平和学说虽然都不详，但其传世的《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学说和格言》(尤其全书最后一卷)明显偏向伊壁鸠鲁学派，在其他古代文献中也找不到证据说明第欧根尼是柏拉图主义者，因此，我们对于他大体可靠的记载还是

① 中译文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171-222页。

② 参塔兰兰特，《忒拉叙洛斯的柏拉图主义》(Harold Tarrant, *Thrasyllos Plato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页19)。

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警觉,比如说他也许过分强调了忒拉叙洛斯在柏拉图文本史上的地位。至于说古人经常把传说和流言当成史料载入典籍,这种情形在第欧根尼那里似乎也无例外。

既然第欧根尼不是柏拉图的门徒,那么其“柏拉图导读”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即便他是学园中人,他的“师门杂记”也必由来有自。有人认为他手中必然有忒拉叙洛斯的导论性著作,其3.1节讲述柏拉图生平的部分,似乎就是直接从忒拉叙洛斯那里来的。塔尔兰特(Harold Tarrant)分析了第欧根尼材料来源的五种可能性之后,认为第欧根尼的记载不是自己独创的,也不是直接承自忒拉叙洛斯,而是来自忒拉叙洛斯的后学,尤其是中间57-61a关于忒拉叙洛斯的那部分文献。

阿里斯托芬以降的亚历山大里亚编辑传统在忒拉叙洛斯以及第欧根尼那里的影响依然存在,而最为重要的是,同时代的柏拉图主义在第欧根尼编写的这部“导读”中影响甚巨。^①《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学说和格言》第三卷67节以下对柏拉图“学说”长篇的讨论更多是“柏拉图主义”的论调,其中“灵魂、自然、善恶、正义”等问题正是第欧根尼时代的柏拉图主义者喜欢谈论的话题。

第欧根尼既不是学园中人,也不是柏拉图专家,他的材料虽与柏拉图主义者有着深刻的关联,但与柏拉图的思想相去已远,因此,他的文献记述虽较为可信,但无疑也有所夸大。^②至于说他对柏拉

① 塔尔兰特,《忒拉叙洛斯的柏拉图主义》,前掲,页17-30。

② 当然,这种夸大也许是后人自己弄出来的。因为材料不足,后人便过分看重了他的记载,因此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认为忒拉叙洛斯是柏拉图著作“四联剧”编法的创始人以及柏拉图著作副标题的始作俑者,从而产生了“严重的误导”(gravely misleading story of Thrasyllus' role, 塔尔兰特语,见《忒拉叙洛斯的柏拉图主义》,页29-30),忽视了忒拉叙洛斯同时代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尤其忽视了柏拉图学园对于柏拉图文献的基准价值:最可信的记载当然在柏拉图的嫡系传人那里——只不过学园中人都把柏拉图的学说和文本视若珍宝,秘不示人,结果让外人的解释大行其道而已。

图义理的分析,则更多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柏拉图主义的理论。柏拉图著作最权威的证据,迄今还在冰山之下。

2. 忒拉叙洛斯

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柏拉图著作编排体系经过中世纪而来自忒拉叙洛斯。忒拉叙洛斯生卒年和出生地都不详(有学者认为他就是来自埃及 Mendes 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我们仅仅知道他是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提比略(Tiberius, 公元 14-37 年在位)的御用“监天正”(astrologer, 或译“占星家”)。忒拉叙洛斯也没有著作传下来,他的只言片语和编纂柏拉图著作的丰功伟绩都是靠他人(尤其是第欧根尼)的记载才为我们所知,^①因此从第欧根尼那里再往前走,柏拉图的经学史大多是猜想,顶多是推测,一鳞半爪的材料很难帮助我们完整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当然,我们对这种材料不足征的情形也并不是完全束手无策。

从第欧根尼的记载可知,至少在忒拉叙洛斯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柏拉图有三十六部作品,而其余诸如《西绪福斯》等著作,虽归在柏拉图名下,但肯定是伪造的。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忒拉叙洛斯是如何对待这三十六部作品的。有的学者认为忒拉叙洛斯不仅按照“四联剧”的模式编排了柏拉图全集,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校勘过柏拉图的著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柏拉图全集是经过忒拉叙洛斯处理过的。还有的学者认为忒拉叙洛斯虽然在柏拉图经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毕竟不是柏拉图学园(包括雅典学园和亚历山大里亚学园)中的主持人(甚或其成员),因此算不得柏拉图主义者,^②那么他的工作不过是利用柏拉图著作来“六

① 塔尔兰特把有关忒拉叙洛斯的材料收集在一起,见《忒拉叙洛斯的柏拉图主义》,页 215-249。

② J. M. Rist, M. R. Dunn 和 H. Doerrie 等人就把忒拉叙洛斯从柏拉图主义史中排除出去了,参塔尔兰特,《忒拉叙洛斯的柏拉图主义》,前揭,页 11。

经注我”而已。

在忒拉叙洛斯所处的时代,雅典学园尚在,而且亚历山大里亚学园的傳統依然处于十分强势的地位,因此忒拉叙洛斯要在柏拉图著作的编校上下多大功夫,似乎不太现实。即便忒拉叙洛斯“编辑”过柏拉图著作,也主要是指他在形式上按照一定的体例来组织现成的文本,而不是指他在柏拉图著作内容上有什么重要的贡献——这种事情在雅典学园内部更为可能,而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那些专业编辑的工作。再退一步说,即便忒拉叙洛斯在内容上有过编校行为,这与其外在的编排所产生的影响相比较而言,那也是微不足道的。换句话说,忒拉叙洛斯的历史功绩,不在于编校了柏拉图著作,而在于按照一定的形式排列了柏拉图的著作,由此给我们留下了柏拉图著作真伪的可能依据。

但柏拉图著作的这种四联剧形式真的是忒拉叙洛斯的首创吗?据第欧根尼记述,此前的阿里斯托芬已经用一种“三联剧”的形式来排列柏拉图的著作,忒拉叙洛斯的工作不过是在此基础上作了调整而已。而且阿里斯托芬的编排方法也并非自己的首创,它必定有所参照和模仿。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柏拉图著作的“四联剧”形式在忒拉叙洛斯之前很早就已经有了,从古罗马伟大作家瓦罗(Varro,前116-前27,曾在雅典学园求学)、新柏拉图主义的先驱阿尔比努斯(Albinus,公元2世纪)和亚历山大里亚“缪斯宫”(Museum,或作“博物院”)最后一位“祭酒”泰翁(Theon,约335-405)的记载来看,柏拉图著作也许一直就有某种类似于“四联剧”的编排方式,甚至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想,这种形式很可能还是精通戏剧形式的柏拉图本人亲自安排的(泰翁即如此认为),其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有一个正确的入门方法和阅读路径。^①

忒拉叙洛斯为什么还要在雅典学园和阿里斯托芬已有的编排

① 参塔尔兰特,《忒拉叙洛斯的柏拉图主义》,页11以下。J. A. Philip极力主张这个观点,认为老学园时期就有了这种“四联剧”方式。

方式上另起炉灶呢？对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预备性的问题，忒拉叙洛斯编排的顺序不等于柏拉图写作次序，而毋宁是研读顺序——尽管研读顺序比写作次序（即所谓“编年”）重要得多，但它与柏拉图本人的意图似乎并无多少关系。而忒拉叙洛斯编排柏拉图著作的目的主要在于表达自己对柏拉图思想的理解，准确地说，主要是建立自己的“柏拉图主义”。在他的九组四联剧中，逻辑、伦理和政治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尤其是忒拉叙洛斯对逻辑、形而上学和宇宙论的强调，为柏拉图主义理论的“新柏拉图主义”转向奠定了基础。柏拉图主义虽然与新柏拉图主义有着很大的差别，但他们都有着对形而上要素（比如逻辑、数学和天文学）的偏爱，可以说它们联手把苏格拉底－柏拉图费尽心思从天上拉下来的哲学又送回了天上，偏离了“柏拉图式”的主航道。^①

忒拉叙洛斯的学术身份虽然有些模糊，^②他对中期柏拉图主义、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早期基督教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却是有案可稽的。尽管他的编排方式是一种“六经注我”，但他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柏拉图思想全貌的参考图，尤其难得的是，他为我们保存了柏拉图著作真伪问题的一种可能的线索。^③但那仅仅是可能的线索而已，真正可靠的线索也许还需要进一步发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忒拉叙洛斯是柏拉图文本史上最后一个对柏拉图著作进行大规模收集、整理和编排的学者，他的普遍体系成为后世所有柏拉图全集的蓝本，也是“真伪”问题最常用的证据。从忒拉叙洛斯－第欧根尼以后，学者们（尤其是新柏拉图主

① 塔尔兰特，《忒拉叙洛斯的柏拉图主义》，页9－10。

② 塔尔兰特在《忒拉叙洛斯的柏拉图主义》中认为忒拉叙洛斯是柏拉图主义者，而数年后他又认为忒拉叙洛斯与其说是柏拉图主义者，不如说是柏拉图式的学者（Platonic scholar），参氏著，《柏拉图最早的解释者们》（*Plato's First Interpret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页77）。

③ 关于忒拉叙洛斯的柏拉图主义及其历史影响，参塔尔兰特，《忒拉叙洛斯的柏拉图主义》，页207以下。